

印尼西加里曼丹華族社會的變遷

曹淑瑤*

摘要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 Barat)位於婆羅洲島西北部，與今日馬來西亞砂拉越州毗鄰，又與新加坡隔南中國海對望，婆羅洲島最長的河流——卡江(Sungai Kapuas)由東向西貫穿了這片赤道橫跨的土地。

華人踏足婆羅洲島西部地區的歷史甚早，做買賣原是他們前來此地的目的，遲至十八世紀中葉，又轉而投入當地的採金事業。淘金致富的美夢以及原鄉經濟的窘迫，迫使華人相繼南來，隨著移民群體的擴大，也因應外部政經局勢的變遷，這個在婆羅洲島西部聚集的華族社群內部日漸多元化。

本文擬運用跨區域流通的歷史文本及田野調查所採集的地方性文書、照片與口述訪談等資料，探討西加華族社會的變遷，以增進吾人對海外華族社會多元化面貌的認識。

關鍵字：印尼、西加里曼丹、華人

一、前言

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 Barat，簡稱西加)位於婆羅洲島西北部，與今日馬來西亞砂拉越州(Sarawak)毗鄰，又與新加坡隔南中國海對望。由於荷屬東印度殖民地政府曾在此地設置「西婆羅洲府」(Residentie Wester-Afdeeling van Borneo)，故嘗以「西婆羅洲之名為人所知。中央赤道橫跨這片土地，形成高溫潮濕又多雨的氣候，濃密的熱帶雨林覆蓋全地，河道曲流蜿蜒其間，導致其陸路交通難以發展，內陸人煙稀少，⁵⁶³ 開發落後，由東向西奔流入海、河道綿長且支流交錯的卡江(Sungai Kapuas 又稱坤江)，遂成為貫通此處內陸與沿海地區的重要交通命脈。在十八世紀中葉華人大量移入之前，被華人通稱為「嘮子」、「勞子」或「勝族」的達雅克人(Dayaks)，是這片遼闊雨林裡的原始住民，以狩獵、採集和游耕為業，開化較晚，崇尚獵頭習俗；⁵⁶⁴ 至於沿海與河口地區，則是島外移入的民族如馬來人(Malays)、武吉斯人(Bugis)、阿拉伯人(Arabs)的勢力範圍，他

* 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⁵⁶³ 根據 1930 年人口普查，荷屬婆羅洲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僅 4 人；1961 年人口調查，印尼屬加里曼丹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為 7.6 人。參見丘守愚，《東印度與華僑經濟發展史》(上海：正中書局，1947 年)，頁 14-15；鄭資約，《東南亞地理誌略》(臺北：國立編譯館，1974 年)，頁 27。

⁵⁶⁴ 鄭資約，《東南亞地理誌略》，頁 60-61。直至 20 世紀末，達雅克人仍常以獵頭的方式攻擊華人或馬都拉人(Madurese)等島外移入的民族，見 Taufiq Tanasaldy, *Regime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ndonesia: Dayak Politics of West Kalimantan* (Leiden: KITLV Press, 2012), p.198.

們在這裡組成土邦，從事商業和搶掠的活動，並向其治下民族課徵稅收和勞役。

565

歷史上華人與西加地區的接觸，應當起源甚早，位於西加北部三發河(Sungai Sambas)沿岸的三發(Sambas)一帶曾有漢代綠釉龍柄勺的出土，⁵⁶⁶ 足資證明。由於這裡盛產著在中國市場上具高經濟價值的香料、藥材與林木資源，且當地民族在工藝技術上又相對落後，因此，以中國製造的工藝品交易這裡的土特產，應是早期華人往來此地的主要目的。1721年荷蘭探險家 Jacob Roggeveen 即指出華人已居住三發與沿海的喃吧哇(Mempawah)等地，從事絲綢、花布與其他來自中國、日本商品的售賣。⁵⁶⁷

早期華人或只在西加沿海或距離海岸不遠的沿河地區進行買賣。然而，十八世紀中葉西加採金事業的興起，使華人在西加的經濟活動陡變，大批華人相繼南來，湧入內陸礦區淘金，再隨著採金地點的轉移，溯卡江而上，逐漸深入到婆羅洲島的中央。座落在卡江下游臨海沖積平原上的坤甸(Pontianak)，以及分布在卡江暨其支流沿岸的東萬律(Mandor)、大院(Tayan)、上侯(Sanggau)、昔加羅(Sekadau)、新釘(Sintang)、彬路(Nansa Pinoh)等埠，與坤甸以北沿海的喃吧哇、山口洋(Singkawang)、邦戛(Pemangkat)、三發等市鎮，都有華人開墾的足跡。但是，華人向西加內陸的經濟擴張，一方面導致其與散布內陸的達雅克民族間的緊張，另一方面也加劇族群內部的競爭，或為求保命，或為求鞏固自身利益，他們在當地形成獨特的自治團體，直至被荷蘭的殖民勢力逐一瓦解。此後，西加華人經歷荷蘭的殖民、日本的統治，以及印尼的獨立。這些政治上的巨變，導致西加華人幾經離散，對於他們的群體認同之形成與凝聚，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本文擬運用跨區域流通的歷史文本及田野調查所採集的地方性文書、照片與口述訪談等資料，探討西加華族社會的變遷，以增進吾人對海外華族社會多元化面貌的認識。

二、近代西加華族社會的形成

華人踏足婆羅洲的歷史雖早，卻多因商業買賣與季風航行的緣故，而有「住

⁵⁶⁵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pp. 140, 144.

⁵⁶⁶ 溫廣益、蔡仁龍、劉愛華、駱明卿編著，《印度尼西亞華僑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夾頁圖，未編頁碼。

⁵⁶⁷ 轉引自田汝康，〈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末期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組織〉，收入田汝康，《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8。

蓄」的情形。當時華人常與當地住民雜居共處，但由於他們的群體規模較小，流動性也大，或有因通婚混血而留下的後嗣，卻也往往融入在地社會，並不以華人的身分自居。⁵⁶⁸ 今日西加華族社群的形成，則源自十八世紀中葉因金礦開採而湧入的大批華工。

西加地層蘊藏金礦與鑽石。十三世紀時，興起於爪哇島東部的滿者伯夷王國(Majapahit)勢力曾延伸至西加內陸，很有可能就是為了控制這些礦產。⁵⁶⁹ 約在1750年左右，大批疑似來自汶萊或邦加(Banka, Bangka)的華工，⁵⁷⁰ 在喃吧哇的馬來「喃吧漢」(Panembahan)招募下，⁵⁷¹ 聚集坤甸北邊的百富院(Sungai Duri)一帶淘金，⁵⁷² 隨即三發等地的馬來蘇丹們也招募華工前去採金，採礦的地點很快地從萬律河(Sungai Mandor)上游，向北延伸至喃吧哇河(Sungai Mempawah)南岸支流，再擴大至打嘮鹿(Montrado)，深入三發的內陸地區。

此時西加盛產的金礦以砂金為主，主要分布在距離地表2呎到12呎或8呎到15呎深處的鬆軟黃土裡，華工採用引水淘洗表層砂金的技術，將這些含有砂金的鬆軟黃土放入小水道內，引河水沖洗，密度較輕的泥沙和其他雜質會被流水沖刷掉，留下密度較重的砂金。⁵⁷³ 最初，華人是以小團體的形式，在山坡地區進行金砂的淘洗。這些小型採礦組織被稱為「山沙」(shansha)或「把壢」(parit)，人數介於10至25人之間，⁵⁷⁴ 通常是基於血緣與地緣的結合，採互助投資的方式集資，⁵⁷⁵ 他們依附在馬來蘇丹或喃吧漢的控制下，並受到後者高度的剝削。⁵⁷⁶

⁵⁶⁸ 例如：位於婆羅洲島東北部的馬來西亞沙巴州(Sabah, Malaysia)，有一個名為「杜森」(Dusun或譯杜順，1961年8月改稱嘉達山 Kadazan)的民族，容貌與華人極為相似，相傳是華人的後代，但其語言文化與族群認同，自成一系，實與華人有別，他們既不認為自己是華人，也不被華人視同一分子。有關杜森人的起源傳說，參見〈北婆杜森族研究〉，《南洋商報》1950年5月24日，第7版；〈北婆的杜森族〉，《星洲日報》1951年11月18日，第8版。

⁵⁶⁹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 139.

⁵⁷⁰ James C. Jackson, *Chinese in the West Borneo Goldfields: A Study in Cultural Geography*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Publications, 1970), p. 20.

⁵⁷¹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Leiden: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and Amerindian Studies, CNWS, Universiteit Leiden, 2000), p. 25.

⁵⁷²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Ithaca, N. 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3), p. 51.

⁵⁷³ E. Doty and W. J. Pohlman, "Tour in Borneo, from Sambas through Montrado to Pontianak, and the Adjacent Settlements of Chinese and Dayaks, during the Autumn of 183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No. 6 (1839), pp. 287, 289; George Windsor Earl,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32-33-34* (London: W. M. H. Allen and Co., 1837), pp. 285-286.

⁵⁷⁴ 周丹尼(Daniel Chew)著，黃順柳譯，《砂勝越鄉鎮華人先驅》(砂拉越古晉：譯者自版，1990年)頁26。

⁵⁷⁵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p. 37-38.

⁵⁷⁶ 田汝康，〈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末期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組織〉，頁62。

隨著採礦規模的擴大，採礦組織也逐漸發展為成員較多，且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高度自治的「會」或「公司」；⁵⁷⁷ 復因採礦團體之間的利益競奪，為鞏固勢力與謀求生存，這些華人公司開始透過聯合或兼併的方式，形成所謂「開香公司」的聯合組織，⁵⁷⁸ 例如：1776 年時成立的「和順總廳」，即是分布在打嘮鹿與三發的 14 家公司的聯盟，總部設在大港公司所在的打嘮鹿市鎮，勢力範圍涵蓋百富院、孟加影(Bengkayang)至三發一帶。⁵⁷⁹

由於採金能創造的豐厚獲利，⁵⁸⁰ 對受迫於原鄉經濟困難的華人產生極大的吸引力，在 18 世紀的 60 年代與 70 年代，每年農曆的 2、3 月間，約有 1,500 至 2,000 人自粵東的潮州、嘉應州(梅州)、惠州及閩南地區前來婆羅洲西部，至 18 世紀末，據估西加華族人口已超過 40,000 人。⁵⁸¹ 根據 1834 年從新加坡前往西加地區與和順總廳商談鴉片貿易的英籍商人 George Windsor Earl 之記載，在 1823 年荷蘭控制婆羅洲西岸沿海地區以前，每年約有 3,000 名華人移入這個地區，粗略估算華族人數約有 15 萬，其中 9 萬人住在內陸華人區裡，其他人則散居在荷印政府控制的區域。⁵⁸² 內陸的聚落如打嘮鹿、東萬律、喇喇、爐末等處，皆因礦業而成為華人聚集之處。

基於血緣與地緣的連結，早年在西加採礦的華人，係以來自廣東嘉應州的客家人，以及來自惠州府的海豐、陸豐與潮州府的大埔、河婆(揭西)、惠來等地操客語的「半山客」(pansanhak)為主。⁵⁸³ 隨著採礦規模的擴大以及淘金所帶來的

⁵⁷⁷ 英籍港腳商人 George Windsor Earl 就認為這片「華人領地」(Chinese territory)是一個「自由邦」(free state)，因此，當 1834 年他前來婆羅洲西部欲與和順總廳進行鴉片貿易時，並未向荷印政府派駐三發的「里思麟」(resident)取得許可，見 George Windsor Earl,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32-33-34*, p. 304.

⁵⁷⁸ S. H. Schaank, “De Kongsis van Montrado,” p. 29。田汝康譯為「開箱公司」，袁冰凌則譯為「開香公司」，見田汝康，〈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末期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組織〉，頁 65；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 45.

⁵⁷⁹ 田汝康，〈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末期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組織〉，頁 64。

⁵⁸⁰ 根據 1812 年的估算，西婆羅洲每年黃金產值高達 474 萬西班牙銀元，見 Hugh Low, *Sarawak: Its Inhabitants and Production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8), p. 24.

⁵⁸¹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p. 25-27, 32.

⁵⁸² George Windsor Earl,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32-33-34*, p. 250.

⁵⁸³ 田汝康，〈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末期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組織〉，頁 63-64；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 15。袁冰凌認為「半山客」是能操雙語的客家人與福佬人，見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p. 15, 30。但袁的看法與 1838 年時從新加坡搭乘帆船抵達西加傳福音的兩位美國傳教士 E. Doty 和 W. J. Pohlman 的經驗極具差異。根據 Doty 和 Pohlman 的觀察，他們從三發前往坤甸途中所行經的華人聚落，居民皆以客家人(Khêh men)為主，除爐末的客家人會說一種「混雜的福建話」(mongrel Fuhkeën)，都是說客語(Khêh dialect)。由於閩、客方言的差異性，阻礙了他們兩人以福建話與當地華人溝通的可能，一旦連馬來語都無

利益與競爭，似使這些華人公司必須接納具備不同功能的成員加入，以配合採礦之外其他事業的發展，⁵⁸⁴ 西加華人移民的來源因而多元化，間或混雜著操閩南方言而被稱為「福佬」的潮州人，⁵⁸⁵ 及操閩南語的福建人、自稱「本地人」的廣府人等，例如：1818 年至 1819 年間短暫擔任和順總廳「大哥」的胡亞祿即是福建人，他原是在三條溝公司負責煉鑄刀劍的鐵匠。⁵⁸⁶

大抵上，在海外華族社會裡，方言群體與其職業、居處向來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此現象在西加亦然。在內陸礦區裡，人數極具優勢的客家人，大多是採金礦工，平日在礦坑勞動，少部分人則是擔任農人、漁夫和小商人，居住在公司境內規模較小的聚落巴剎裡；至於坤甸、三發、打嘮鹿等較具規模的市鎮裡，其華族居民則以粵東的潮州人為主，間雜少數福建人和廣府人，他們多是商人、工匠和工人，掌控市鎮的商業與製造業。⁵⁸⁷

三、荷治時期西加華族社會的轉型

在華人採金事業興盛之際，荷蘭殖民勢力也擴張至此。荷印政府接管荷屬東印度後，自 1823 年起，要求西加華人繳交每年 2 盾的人頭稅(或稱「人子揮錢」)，入境時每人得繳交 2 盾，離境時再繳交 1 兩黃金，1825 年起再規定輸入華人公司的所有物品須課征 12% 的稅。蘭芳公司總廳首先臣服於荷印政府，其第 6 任總廳大哥劉台二於 1824 年接受荷印政府授與的「甲太」(Kaphthai)頭銜；以大港公司為首的和順總廳，一方面與荷印政府武力對抗，另一方面又與三條溝公司、蘭芳公司陷入爭鬥，1851 年 1 月被迫接受荷印政府敕封，⁵⁸⁸ 1854 年 7 月再被荷印政府聯合蘭芳公司派軍擊潰。倖存的蘭芳公司於 1856 年和荷印政府訂約劃分勢

法應用，他們與當地華人就只能採用中文筆談，使他們體會到這個「他們一無所知的語言」對於此地區福音的傳布工作具有「極大的用處」，見 E. Doty and W. J. Pohlman, "Tour in Borneo, from Sambas through Montrado to Pontianak, and the Adjacent Settlements of Chinese and Dayaks, during the Autumn of 183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No. 6 (1839), pp. 294, 296, 304.

⁵⁸⁴ 由於華人公司為能自給，在採礦之外，必須經營其他事業，例如：在沿海地區製鹽、捕魚、製魚乾；在內陸礦區周圍種稻、蔬菜和養豬；在轄下區域裡設立印尼語稱為「巴剎」(pasar) 的市集，開鴉片館、賭場、屠宰場、釀酒廠，以及辦製華人所需各式器具的作坊，供人採買民生用品，見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p. 40-41, 155.

⁵⁸⁵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p. 27-29.

⁵⁸⁶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p. 15, 77, 97.

⁵⁸⁷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p. 72-73.

⁵⁸⁸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p. 112-146, 160-184, 246.

力範圍，⁵⁸⁹ 至 1884 年甲太劉阿生過世後，亦被荷印政府解散。⁵⁹⁰ 一些華人持續抗荷印政權的控制直至 1888 年，而長期的動盪紛擾，也造成大批華工及眷屬渡越到砂拉越尋求發展。⁵⁹¹

在華人公司解散後，西加華人從礦業淡出，轉向農業與商業發展。根據荷印政府對轄下西婆羅洲府外籍東方人職業的統計，⁵⁹² 1875 年時登記為礦工者 1,574 名，登記為商人者 1,942 名，登記為工匠者 650 名，登記為農民者 3,506 人；1891 年時，礦工人數減至 1,085 名，農民則增至 4,604 人，商人有 1,838 名；1895 年時，礦工人數再減為 1,043 人，農民則增至 4,799 人，商人增至 2,226 名。⁵⁹³ 至 1930 年，西加華人中有職業者，51.4%從事初級原料生產及園藝，48.6%從事貿易與商業活動。⁵⁹⁴

在人口數量上，雖然荷印政府對華人公司的武力征伐以及限制華人入境的措施，一度導致西加華族人口衰退至 1856 年的 24,000 人，但由於甘蜜、胡椒、椰樹與膠樹等經濟作物的栽植及原料的初級加工所產生的勞力需求，西加華人人數從 1880 年的 28,000 人，增至 1895 年的 37,000 人，1900 年有 41,500 人，1905 年有 48,000 人，1920 年有 67,000 人，至 1930 年已達 108,000 人。⁵⁹⁵ 在 1905 年至 1930 年間，西加華族人口增長了 120%，平均每年有超過 2,000 人入境，同時，也有大批華人返回原鄉中國，流動性極大。⁵⁹⁶ 在方言群方面，客家人和潮州人是西加華人中主要的方言群體。依據荷印政府 1930 年的人口普查，當時居住在「可以進行全面人口調查的地區」的 66,700 名西加華人中，客家人有 38,323 名，潮州人 21,699 名，廣府人 2,961 名，福建人 2,570 名，其他華人 1,257 名。

⁵⁸⁹ 〈蘭芳公司歷代年冊〉，頁 26。

⁵⁹⁰ Bingling Yuan,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pp.188-259.

⁵⁹¹ 和順總廳在三發發動的戰事，導致該地區的華人逃難砂拉越，見“The Free Press: Sarawak,”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Vol. 17, No.4 (24 January 1851), p. 3；田汝康，〈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末期西加里曼丹的華僑公司組織〉，頁 84-88。

⁵⁹² 華人向來是荷屬東印度外籍東方人口中最大的群體，根據 1905 年人口調查，西婆羅洲外籍東方人有 48,881 名，當中華人有 48,348 名，占外籍東方人口的 98.9%，轉引自“*The Borneo Rising*,”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 Aug 1914, p. 7.

⁵⁹³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p. 99-100, 134, 149-150.

⁵⁹⁴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 161.

⁵⁹⁵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 160。另據曾任職中華民國外交部條約委員會的丘守愚於 1932 完稿的《二十世紀之南洋》一書所載，1930 年西婆羅洲府華僑人數有 109,317 人，見丘守愚，《二十世紀之南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頁 38。

⁵⁹⁶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 159.

在空間分布上，西加華人遷離採金事業興盛時期的內陸聚落，紛紛湧向沿海地區從事農業或商業活動，少部分人則因收購森林產品、淘金或農業拓墾，沿著卡江溯流而上，在各河段建立聚落，最遠能到上游的富都(Putus Sibau)。1930年時，多達73.4%的西加華人居住在山口洋縣轄下的山口洋區與喃吧哇區者以及西婆首府坤甸。⁵⁹⁸ 這種人口的流動與市鎮的興衰，尚可從各聚落的華人僑長派任窺知，例如：1930年代末期，沿海的松柏港(Sungai Pinyuh)設有甲必丹、老大等數名僑長，但曾盛極一時的礦都東萬律，華人僅餘二、三千人，店鋪五、六十間，僅委派一名老大負責華人事務和代送郵務。⁵⁹⁹ 但是，二戰以前的西加華人仍然算不上是市鎮居民，因為他們從事農耕與園藝的人口較多，故而居住市區的人口比例僅占22.2%，高達78.8%的華人居住在市郊鄉村地區，以山口洋縣(Singkawang Afdeeling)為例，在其轄下的山口洋區(Singkawang Onderafdeeling)華人有37,872人，定居於市區者卻僅4,200人。⁶⁰⁰

大抵上，在西加市郊鄉村地區從事經濟作物種植的華人，以客家人為大宗；至於市鎮則因具備較多的功能，必須提供多元的服務，就業機會較多，故而容易吸引不同族群的移入，使其居民的構成更具多樣性。以西加第一大港，同時也是西加首府的坤甸為例，早在19世紀初葉時，馬來人、武吉斯人、阿拉伯人、華人、荷蘭人等族群，已在此地形成各自的聚居區，當中華人的聚居區有兩處，最早發展的是位於卡江南岸的老埠頭，與荷蘭人的聚居區毗鄰，潮州人與福建人主要聚集此處，經營土產、米、糖、油、布賂與百貨的買賣；新埠頭則位於卡江北岸，發展較晚，原是蘭芳公司在此興建鋸木廠和造船廠，沿河有不少工廠、貨倉，是坤甸的工業區、貨倉區，也是客家人聚集的區域。⁶⁰¹ 1939年出版的《荷屬東印度概覽》一書收錄了11位坤甸名僑人物略傳，更可反映出坤甸華族社會多方群體的現象。在這11位坤甸名僑人物中，除一人服務於教育界，一人出身政界，其餘9人皆為商人，主要經營米、糖、油、雜貨等買賣，兼營樹膠、椰干的種植與初級加工、鋸木等製造業，以及航運業。這11人之中，有5人祖籍廣東

⁵⁹⁷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 160.

⁵⁹⁸ 丘守愚，《二十世紀之南洋》，頁38、40。

⁵⁹⁹ 劉煥然編，《荷屬東印度概覽》(下)(新加坡：強華圖書出版社，1939年)，第四編，頁46。

⁶⁰⁰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p. 160-161；丘守愚，《二十世紀之南洋》，頁40。

⁶⁰¹ E. Doty and W. J. Pohlman, "Tour in Borneo, from Sambas through Montra- do to Pontianak, and the Adjacent Settlements of Chinese and Dayaks, during the Autumn of 1838," p. 30；劉煥然編，《荷屬東印度概覽》(下)，第四編，頁38-40；山口洋田野筆記，2011年8月2日。

嘉應州，當中 1 人為新客，4 人為僑生(土生華人)；4 人祖籍廣東潮州，新客與僑生各半；1 人祖籍福建漳州，僑生；1 人祖籍廣東惠州，亦為僑生。⁶⁰² 除此之外，西加第二大港，亦曾是以大港公司為首的和順總廳發展來突破馬來蘇丹或荷印政府挾制的重要港埠，以及生產礦區勞工所需糧食的山口洋，其市區座落著一間大伯公廟(Vihara Tri Dharma Bumi Raya Pusat Kota Singkawang)，該廟正殿主神龕祭客家人稱為「伯公」的福德正神，左神龕祭閩南地區盛行的廣澤尊王，右神龕殿祭潮州盛行的安濟聖王。這三種信仰並立一處，顯現早期山口洋市鎮華族居民的構成包含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等方言群體；同時，也體現出當地農業與商業經濟兼具的特色。

雖然，初期前來婆羅洲西部掏採砂金的華人，或許只是抱持著暫居心態，期盼一朝榮歸故里；可隨著一些人與達雅克婦女通婚，⁶⁰³ 或者攜家眷南來，家庭的建立有助於血脈的繁衍，華族社會也就因此得以延續發展，落地生根。至 1930 年，多達 75% 的西加華人出生當地，比例與爪哇華族社會相仿。⁶⁰⁴ 不少西加華人自先輩南移雖已迄五、六世之久，⁶⁰⁵ 卻不似其他荷印地區土生華人具明顯的「印尼化」傾向，⁶⁰⁶ 反而「自視為異鄉人，即便他們已經土生數代，擁有土地，且從未到過中國。」⁶⁰⁷ 這種「異鄉人」的心態，或能從西加華人慣常的語言窺知，因為對於民族而言，語言向來被視作民族文化的一種體現，以作為分辨我群與他者之間的重要標準。根據 1920 年荷印政府的人口普查，高達 99% 的西加華人以中國方言為其主要語言。⁶⁰⁸ 從西加華族方言群體的構成，所謂的中國方言，不外乎客家話與潮州話。由於客家人是西加華族裡的優勢群體，其經濟活動涵蓋農、商、礦等等產業，居住地遍布沿海、內陸的市鎮以及郊區鄉間，使得客語成為分布最廣的華族方言，自坤甸新埠頭一路北行經百富院、喃吧哇、孟加影、山口洋、邦戛至三發一帶，以及從坤甸溯卡江而上深入婆羅洲內陸的沿河聚落如大

⁶⁰² 劉煥然編，《荷屬東印度概覽》(上)，〈前代典型人物誌〉5、〈現代名僑人物誌〉11、48、49、50，未編頁碼。

⁶⁰³ George Windsor Earl,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32-33-34*, p. 259.

⁶⁰⁴ 爪哇華人士生的比例則為 79%，見 W. J. Cato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 pp. 40, 160.

⁶⁰⁵ 例如：曾任吧城中華女學校總理的張懷金，祖籍廣東惠州，出生在位於卡江上游的新釘，是第 5 代土生華人；曾任坤甸中華總商會主席的林儒榮，為祖籍廣東蕉嶺的客籍土生華人，已移居坤甸 6 世，見劉煥然編，《荷屬東印度概覽》(上)，〈現代名僑人物誌〉11、49，未編頁碼。

⁶⁰⁶ 廖建裕，《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 年)，頁 53、59、76。

⁶⁰⁷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 196.

⁶⁰⁸ Charles A. Coppel,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58.

院、上侯、昔加羅、雙溝月(Sungai Ayak)、新釘、彬路、文律(Boedoet, Nansa Bunut)、富都等聚落，都是客語分布區域；若再細分腔調，西加通行的客語尚可以百富院為界，自百富院以北至三發一帶盛行海陸豐與河婆客話；百富院以南至坤甸新埠頭再上溯卡江沿岸則盛行四縣客語。同時，客語也成為西加華族之間跨越不同方言群體的交際語言。⁶⁰⁹

四、戰後西加華族社會的發展

1942年1月27日，日軍從邦戛登陸，隨即佔領山口洋，並在2月2日攻下坤甸，荷印軍隊在3月8日投降。由於此前荷印軍隊的焦土政策與日軍的軍事活動，大舉破壞西加的港口、道路、橋樑等各項交通設施與民間企業的工廠、貨倉，導致西加百廢待舉，物資嚴重缺乏。日軍統治期間，華人在商業活動上遭受排擠，⁶¹⁰ 許多華族社會菁英經過顛沛流離，仍遭日軍搜捕屠殺；⁶¹¹ 戰後重返的荷印政府為對抗蘇卡諾領導的印尼共和國之勢力，對荷屬東印度的進出口貿易採取嚴格的壟斷措施，極力扶助荷商與印尼民族商人，在在使西加華人的經濟惡化。1949年12月27日自荷蘭取得獨立的印尼政府，⁶¹² 對境內華人在經濟領域上的優勢，以及華人與原鄉中國之間的聯繫，充滿敵意。

自1950年代開始，印尼政府極力推動排華，陸續頒布法令限制華人移居印尼，規定離境前往中國的華人不許重返印尼，向華人徵收高額的外僑稅，⁶¹³ 自1952年5月起，又陸續發布法令限制華僑辦學，監督華校的教學內容、教科書的採用，不准華校招收印尼籍學生，並限制華校開辦的地點；1957年開始關閉部分地區的華文學校；1958年4月下令封閉華文報刊；1958年10月關閉與印尼

⁶⁰⁹ 祖籍為廣東潮州汕頭的周沅瑤，曾向著者表示山口洋華人主要使用客家話，因此他笑稱自己為「汕頭客」。周沅瑤活躍於雅加達華族社團並擔任要職，諸如：地緣性社團的印尼潮州總會及潮州鄉親公會秘書長、旅椰山口洋地區鄉親會會長；血緣性社團的雅加達周氏宗親會主席；方言群社團的雅加達客屬聯誼會。訪問旅椰山口洋地區鄉親會會長周沅瑤於雅加達客屬聯誼會辦公室，2011年7月31日。

⁶¹⁰ 日軍佔領期間，引進日資企業控制了西婆羅洲的進出口貿易，1944年起又成立許多「組合」以壟斷商品的流通買賣，扶植原住民族零售商，致力將華人排擠出商業領域，見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p. 199-200.

⁶¹¹ 有關1943年初至1945年2月間日軍在婆羅洲西部進行大屠殺行動，參見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p. 203-208；許行，〈西婆羅洲華僑血史一頁〉，收入文化出版社編輯部，《戰後南洋華僑概況——西婆羅洲之部》，頁9-12；林漢文，《我所經歷的坤甸大屠殺》，頁38-88；李學民、黃昆章，《印尼華僑史(古代-1949年)》(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404-440。

⁶¹² 〈女王昨簽署海牙協定 荷對印尼主權結束〉，《南洋商報》1949年12月28日，版1。

⁶¹³ 黃昆章，《印尼華僑華人史(1950至2004年)》(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2-7。

無外交關係的國家之僑民設立的組織，1959年5月起禁止使用華文招牌。⁶¹⁴ 印尼在經濟上的排華，⁶¹⁵ 對於華族社會衝擊更大，尤其1959年頒布的〈總統第10號法令〉(Peraturan Presiden 10,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10)，宣布自1960年1月1日起禁止縣城以下鄉村地區的外僑經營小商店或擔任零售商，⁶¹⁶ 該法令一經頒布，印尼軍方就開始執行驅離華人的行動。⁶¹⁷ 由於西加華人多以農工、零售商、中間商為業，在這一波波產業印尼化的過程中，他們首當其衝，生計受到影響，許多人負擔不起高昂的外僑稅，更難以取得印尼的公民權。根據印尼安達拉通訊社(Antara)於1960年4月7日的報導，因〈總統第10號法令〉的實施，在印尼屬加里曼丹辦理登記而聽候遣返共產中國之華僑就有10,200人。⁶¹⁸

1965年9月30日，印尼軍隊發動軍事政變，⁶¹⁹ 雖然事件很快地被平定下來，但印尼軍方卻聲稱該政變是中國與一些印尼華族所支持的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策動的，於是反共的行動遂演變為激烈的反華浪潮。1966年3月12日蘇哈托受印尼人民協商大會特別委員會的委託，代行總統職，⁶²⁰ 開始進行肅共行動，⁶²¹ 從爪哇派遣軍隊前往西加掃蕩活躍於婆羅洲印馬邊界上的砂共——「砂拉越人民遊擊隊」(Pasukan Guerrilla Rakyat Sarawak, Sarawak People's Guerrilla Army)。⁶²² 1967年7月間，印尼全國性與地方性的報紙一再將西加華人「妖魔化」(demonizing)為共產分子，宣傳西加是共產中國的飛地(enclave)；⁶²³ 印尼軍方更曾拜訪西加各地的達雅克人領袖時，指責華人「都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共產黨徒」，⁶²⁴ 挑動達雅克人對華人的種族情緒，藉由砂共曾於

⁶¹⁴ 丘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22-29、36-40；黃昆章，《印尼華僑華人史(1950至2004年)》，頁71-72、95-96。

⁶¹⁵ 郭梁，《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簡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64-165。

⁶¹⁶ 〈印尼內閣議決禁止外僑小商〉，《南洋商報》1959年11月6日，版3；〈印尼國會一致通過支持禁鄉村外僑經營零售商〉，《南洋商報》1959年12月31日，版3。

⁶¹⁷ 〈蘇北亞齊廖省鄉村華僑小商今年必須停止營業 僅准在三十一市鎮營業 華僑小商淚訴痛苦求當局通融〉，《南洋商報》1959年7月20日，版12；〈執行鄉區零售商禁令 印尼軍方在西爪逮捕華僑百餘人〉，《南洋商報》1959年12月5日，版1。

⁶¹⁸ 〈印尼屬婆羅洲華僑 登記後輪返國者 已有一萬二百名〉，《星洲日報》1960年4月9日，版2。

⁶¹⁹ 這個被稱為「9•30運動」的政變與反政變成因眾說紛紜，相關討論可參閱鄭學稼，《印度尼西亞史》，頁249-330。

⁶²⁰ 〈印尼陸軍攤牌獲全勝 蘇哈多著手接管政權 以蘇卡諾總統名義發施號令 宣布解散內閣 逮捕親共部長 封禁共產黨及屬下一切組織〉，《南洋商報》1966年3月13日，版1。

⁶²¹ 〈蘇哈多代表蘇卡諾下令印全國政府機關一概須肅清共黨〉，《南洋商報》1966年4月2日，版2。

⁶²² 〈印尼派一營及一連軍隊往西婆邊區圍剿共產黨〉，《南洋商報》1967年8月20日，版1。

⁶²³ Taufiq Tanasaldy, *Regime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ndonesia: Dayak Politics of West Kalimantan*, p. 143.

⁶²⁴ Soemadi, *Peranan Kalimantan Barat dalam menghadapi subversi komunis Asia Tenggara: Suatu*

1967年9月3日攻擊孟加影區北部華莪(Sanggau Ledo)附近一個名為 Taum 的達雅克人聚落的傳聞，⁶²⁵ 鼓動達雅克人向華人展開報復，導致 1967 年 10 月中旬至 1968 年 1 月之間，在西起自喃吧哇、松柏港與孟加影的郊區，北至華莪，南至阿羊岸、東萬律、邦加寧(Menjalín)及打獵鎮(Senakin)的這片區域，爆發華人稱為「紅頭事件」的種族屠殺慘案，粗估有多達 50,000 至 117,000 名的原本居住在內陸鄉間的華族淪為難民，⁶²⁶ 或搭卡車，或乘小舟，或步行，陸陸續續自內陸鄉村逃奔到山口洋、坤甸與松柏港等沿海市鎮。⁶²⁷

由於印尼政變之後，基於反共的理由，一度禁止共產國家輪船川航印尼；⁶²⁸ 1966 年 4 月中旬，印尼外交部長馬力克(Adam Malik Batubara)宣稱印尼華人「儘可回國」，但拒絕為他們安排船運。⁶²⁹ 同年 5 月中旬，北京當局宣布將派船接華僑返回中國，⁶³⁰ 9 月 6 日再宣布已照會印尼駐北京大使館有關撤僑行動的安排，第一批接僑的中國輪船已定於 9 月 20 日抵達蘇門答臘的棉蘭，之後將再加派其他船隻分別前往爪哇的雅加達、泗水等港口繼續接僑工作。⁶³¹ 但中印雙方因排華議題，外交衝突不斷，關係愈形惡化，⁶³² 1967 年 9 月 15 日印尼訓令駐華使

tinjauan internasional terhadap gerakan komunis dari sudut pertahanan wilayah khususnya kalimantan Barat (Pontianak: Yayasan Tandjungpura, 1974), p. 93, as cited in Nancy Lee Peluso, "A Political Ecology of Violence and Territory in West Kalimantan," p. 52.

⁶²⁵ Taufiq Tanasaldy 認為這個傳聞被攻擊的村落應該是坐落在孟加影區南部鄰近萬那的 Tamu 村，見 Taufiq Tanasaldy, *Regime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ndonesia: Dayak Politics of West Kalimantan*, p. 147.

⁶²⁶ Charles Coppel,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45; Nancy Lee Peluso, "Passing the Red Bowl: Creating Community Identity through Violence in West Kalimantan, 1967-1997," in Charles A. Coppel, ed., *Violence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13.

⁶²⁷ 許多華族難民雖然逃過達雅克人殺戮，最終卻因飢餓與疾病，死於這些沿海市鎮臨時設置的難民營裡，見〈西婆華人流落山口洋鎮 許多臥病無法醫療 企圖自殺了卻殘生〉，《南洋商報》1967 年 11 月 16 日，版 20。親身經歷紅頭事件的紅至樽回憶道：「當時山口洋市區華人總數還不到兩萬人，要養活近十倍的難民，實是無能為力，每天每位難民只分到約二百毫升粥水。飲用水奇缺，難民營都是破舊倉庫，又黑又髒，空氣不流通，幼嬰兒童及老年人，根本就沒法適應這非人居住的地方，死亡率非常高。」見紅至樽，〈鐵蹄踐踏奸殺一家六口見證記：悼念難友杜如明全家遇難 35 周年〉，收入林世芳編，《西加風雲》，頁 32。當年打獵鎮遭受達雅克人襲擊時，20 多名華人慘遭殺害，其餘 600 多名華人雖死裡逃生，卻有半數人因饑餓或疾病死於位於日本溝(Parit Jepang, Jungkat)的收容處裡，見永和，〈西加打獵鎮慘案逃難記〉，收入林世芳編，《西加風雲》，頁 25。

⁶²⁸ 〈自從政變以來 共黨國家輪船 停止川航印尼〉，《南洋商報》1965 年 11 月 6 日，版 1。

⁶²⁹ 〈印尼外長馬力克拒絕安排船運遣送華僑返國〉，《南洋商報》1966 年 4 月 14 日，版 5。

⁶³⁰ 〈中國宣稱將派輪船到印尼載華僑返國〉，《星洲日報》1966 年 5 月 19 日，版 1。

⁶³¹ 〈中國通知印尼將派船接僑〉，《星洲日報》1966 年 9 月 8 日，版 3。

⁶³² 1967 年 4 月 23 日，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遭到印尼武裝部隊扣押，北京當局立即發出強烈抗議的牒文，譴責印尼，要求立即釋放徐仁，翌日印尼政府即宣布中國代辦暨總領事須於當週內離開印尼，北京當局也立即回以相同的報復行動，相關報導見〈中國嚴厲譴責印尼 促即釋放徐仁總領事〉，《星洲日報》1967 年 4 月 25 日，版 1；〈印尼政府昨日宣布中國代辦暨總領事本週內須離開印尼 北京採取報復行動 印代辦與第一參事應在同一限期離境〉，《南洋

館全體職員離開中國，⁶³³ 10月9日再宣布中止與中國的邦交，⁶³⁴ 10月28日北京當局宣布關閉駐印使館，撤回外交官，⁶³⁵ 原已困難重重的撤僑行動，⁶³⁶ 最終停止。因此，當西加種族屠殺慘案後，大批華族難民已無返回中國的可能。

自印尼獨立以來各種排華政策的實施，再次衝擊西加華族社會的發展。首先，在人口結構上，華人在西加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開始下滑，從1953年的25%降至1971年的12%，至2000年時更降至9.45%。⁶³⁷ 種族屠殺事件又促成西加華人劇烈的人口流動，大批原居於內陸鄉間的華族又一次蜂擁至沿海的城鎮。當時坤甸縣長曾指示各區官員將難民遣回，⁶³⁸ 可是位於坤甸與三發縣內陸的13個村村長卻發表聯合聲明，反對華族難民重返他們已被驅逐出的家園。⁶³⁹ 事實上，在華人倉皇地逃離原居處後，他們留下來的財物、食糧、房子、店鋪、田地，已經被達雅克人等原住民掠奪或占據，難民們根本無法再回到原本居住的村落生活。⁶⁴⁰ 於是印尼政府只好擬定沿海一些特定區域以及卡江流域，作為重新安置難民的地點。⁶⁴¹ 1968年2月，收容華人的難民營奉令關閉，⁶⁴² 絕大部分的人就在這些市鎮周圍的荒地上或在已撤除的難民營地上，搭建簡陋的屋子定住下來。⁶⁴³

商報》1967年4月25日，版1。

⁶³³ 〈印尼訓令駐華使館全體職員收拾返國〉，《南洋商報》1967年9月16日，版1。

⁶³⁴ 〈印尼內閣昨緊急會議後宣佈中止與華邦交〉，《南洋商報》1967年10月10日，版1；〈中國專機送印尼外交館返耶 撤離大使館人員〉，《南洋商報》1967年11月1日，版22。

⁶³⁵ 〈中國答覆印尼上週通牒 關閉駐印使館 撤回華外交官〉，《南洋商報》1967年10月29日，版1；〈中印互撤人員 兩國外交中斷 中國飛機載印尼官員抵椰加達 隨即又運返廿名中國使館人員〉，《南洋商報》1967年11月1日，版1。

⁶³⁶ 〈印尼不准許中國派耶城總領事往棉蘭遣僑僑〉，《南洋商報》1966年9月22日，版1；〈中國指印施限制無法派船偕華僑〉，《星洲日報》1967年3月31日，版2；〈中國指責印尼阻撓撤僑工作〉，《南洋商報》1967年5月11日，版24。

⁶³⁷ Taufiq Tanasaldy, *Regime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ndonesia: Dayak Politics of West Kalimantan*, pp. 50, 304.

⁶³⁸ Taufiq Tanasaldy, *Regime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Indonesia: Dayak Politics of West Kalimantan*, p. 145.

⁶³⁹ 〈西婆十三村長聯合聲明 反對華人難民還鄉〉，《南洋商報》1967年12月30日，版20。

⁶⁴⁰ 例如：羅琴梅女士的祖母以及父親的3個兄弟攜家帶眷逃到山口洋後就沒有再回去老家了，一方面是沒有證明文件能讓他們討回已經被霸佔的房子和土地，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心理恐懼，「能逃出來已經很幸運了，留在那裡會被砍掉」，參見黃圓惠對山口洋華人羅琴梅女士的口述訪問(2010/2011年)，頁53。

⁶⁴¹ 〈印尼計畫移殖西婆五萬華人〉，《南洋商報》1968年2月4日，版2；〈印尼西加里曼丹難民營二千多名華人難民死亡 政府撥出二億五千萬盾推行重新安頓難民計畫〉，《南洋商報》1968年6月29日，版1。

⁶⁴²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 253.。

⁶⁴³ 訪問山口洋南華中學畢業校友范鈺釵於其臺灣新竹居所，2014年7月4日；訪問南中校友會山口洋分會初中華文補習班畢業生鍾翠娜於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2014年8月22日。

這一年在山口洋區登記戶口的難民就多達 22,662 人，另有 25,669 名難民在坤甸登記戶口，11,519 名難民在喃吧哇與其周邊地區登記戶口。⁶⁴⁴

這波華族人口向沿海地區的集中，強化了西加華人群居群聚的現象，從而讓華族社會變得高度都市化，然而人口的高度集中卻不能確保相對的經濟成長，反而惡化了沿海市鎮經濟。在種族屠殺事件平息後，西加地區隨即陷入嚴重的饑荒，印尼政府沒有妥善給予華人難民照護與安置，造成許多孩童、老人、孕婦因飢餓與疾病而死亡，一些人因無法承受打擊而精神失常或企圖自殺，⁶⁴⁵ 平均每天有 15 名難民喪命，僅 1968 年上半年死亡人數就超過 2 千人。⁶⁴⁶ 在難民聚集甚多的山口洋市區，當地沒有製造業，市場規模小，就業機會少，難民找不到工作可做，只能跟在地的親人分一點田種米種菜，⁶⁴⁷ 不然就上山砍柴火、摘包裹東西用的樹葉來賣錢，或者編笠帽、草席換生活用品，⁶⁴⁸ 勉強度日子；有些人因為貧病交迫，沒辦法以勞力掙錢，在難民營附近乞討，甚至有稱斤論兩販賣兒女的情況，⁶⁴⁹ 一些年輕女孩子為了生計只好靠皮肉討生活，⁶⁵⁰ 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也讓客家話原意為「小女兒」或「小姐」的「阿妹」(amoy)一語成為妓女的同義詞。⁶⁵¹

經濟難以提振，進一步促成了西加華人自 1970 年代以來不斷地向外遷移，山口洋尤為這波「再移民」最主要的移出地。一部分難民離開經濟惡化的山口洋，再遷移至坤甸南方的道房及卡江中游的上侯、新釘、彬路等地，或離開西加到馬辰、萬隆、茂物(Bogor)、帝博(Depok)、泗水等外省謀生；更有不少華人選擇到印尼首都雅加達討生活，當中有點資本或技術的人就開設成衣廠⁶⁵²、服裝店、裁

⁶⁴⁴ Department Dalam Negri, Indonesia, *Propinis Kalimantan Barat* (Jakarta: Department Dalam Negri, 1968), Appendix VI, as cited in Hui Yew-Foong, *Strangers at Home: History and Subjectivity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 137.

⁶⁴⁵ 〈西婆華人流落山口洋鎮 許多臥病無法醫療 企圖自殺了卻殘生〉，《南洋商報》1967 年 11 月 16 日，版 20。

⁶⁴⁶ 〈印尼西加里曼丹難民營二千多名華人難民死亡 政府撥出二億五千萬盾推行重新安頓難民計畫〉，《南洋商報》1968 年 6 月 29 日，版 1。

⁶⁴⁷ 黃圓惠對山口洋華人溫女士的口述訪問(2010/2011 年)，收入黃圓惠，〈移動在兩個家庭之間：北臺灣印尼客家女性的認同與情感民族誌〉(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2 年)，頁 51。

⁶⁴⁸ 過路客，〈緬懷西加「紅頭事件」五十年〉，《國際日報》2017 年 11 月 27 日，版 A5。

⁶⁴⁹ 〈西婆華籍難民生活悲慘 論斤賣兒女 每公斤只值星馬幣三元或僅換取少許糧食金錢〉，《南洋商報》1967 年 11 月 29 日，版 1。

⁶⁵⁰ 〈西婆華人難民紛紛死亡淪為乞丐娼妓〉，《南洋商報》1968 年 2 月 16 日，版 2。

⁶⁵¹ Mary Somers Heidhues,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 254.

⁶⁵² 今日成衣製造業是印尼最重要的外銷產業，首都雅加達是成衣紡織業重鎮之一，但其成衣與紡織

縫店、麵店、飯店或賣糕餅小吃，不然就是替人打工、當店員等，他們一賺到錢就寄回西加老家，維持原生家庭生計，不少人憑藉一番努力，在事業上獲得不小成就，將家鄉的人一個又一個地帶出來，經由這種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而建立的遷移網絡，在雅加達西區(Jakarta Barat)的五角橋(Jembatan Lima)、鐵橋(Jembatan Besi)、萬登岸(Bandengan)，雅加達北區(Jakarta Utara)的安貝拉(Ampora)、Pademangan 等處，⁶⁵³ 逐漸形成山口洋華人聚居的離散社群；還有一些人遠赴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臺灣、日本打工。⁶⁵⁴

旅「外」的經驗，似乎給予山口洋華人再確認其地緣認同的機會。當他們在西加境外形成的離散社群裡，組織以山口洋華人為成員的社團或活動時，常冠以現居地名組織以山口洋華人為成員的社團或活動時，例如：「旅椰山口洋地區鄉親會」(Perkumpulan Masyarakat Singkawang dan Sekitarnya, PERMASIS)、「山口洋福律旅椰鄉親會」(Perkumpulan Masyarakat Kulor dan Sekitarnya, PERMAKUS)、「山口洋南華中學旅椰校友會」、⁶⁵⁵ 「旅港印尼西加山口洋地區鄉親校友」。⁶⁵⁶ 「旅椰」或「旅港」的用語，不僅說明他們自認自己「漂泊異地」，對現居地抱持「暫居」與「流寓」的意識，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山口洋這個他們出生、成長、離開的土地存有著「故鄉」的體悟。

廠有絕大多數是山口洋華人經營的。訪問雅加達客屬聯誼會秘書長楊建昌、旅椰山口洋地區鄉親會會長周沅瑤於雅加達印尼客屬聯誼會總會，2011年7月31日；訪問赤道基金會文教部主任鍾學勝於山口洋教師聯誼會辦公室，2011年8月3日。

⁶⁵³ 參見過路客，〈緬懷西加「紅頭事件」五十年〉，《國際日報》2017年11月27日，版A5。

⁶⁵⁴ 山口洋南華中學畢業的范鈺釵於1973年前往雅加達工作，她在成衣廠車衣多年，她的將所得大半寄回老家幫助家中年幼的弟妹讀書，幾年後她第三、第四和第五個妹妹也從山口洋來到雅加達成衣工廠，第六個妹妹則透過在日本打拼的山口洋鄉親的介紹，赴日本打工，訪問山口洋南華中學畢業校友范鈺釵於其臺灣新竹居所，2014年7月4日。在新喃村新光明印華公學任教的葉錦進，在其就讀的真光中學關閉後，因學業中斷又找不到工作可做，只好跨境到砂拉越謀生，訪問新喃村新光明印華學校教師葉錦進於新喃村新光明印華學校辦公室，2011年8月4日。

⁶⁵⁵ 在明清文獻裡，華族將吧達維亞(今雅加達)稱為噶喇吧，係源自印尼文的椰子(kelapa)之譯音，故華族常以「椰城」來簡稱吧達維亞/雅加達，或將 Jakarta 音譯為「椰加達」。有關噶喇吧地名的考證，可參閱韓槐准，〈椰加達紀行〉，《南洋學報》第8卷第2期(1952年)，頁45；印尼脫離荷蘭統治後吧達維亞復名為雅加達，見〈三四七年印尼荷蘭統治權正式結束 首都吧城恢復舊名稱〉，《南洋商報》1949年12月28日，版2。

⁶⁵⁶ 「港」即香港。至1976年，超過30萬印尼歸僑離開中國大陸，其中25萬人前往香港，2.5萬人到澳門，見 Michael R. Godley, "The Sojourner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349. 不少在印尼排華時前往中國升學的山口洋華人遷居香港，他們經常號召「旅港印尼西加山口洋地區鄉親校友」參加茶聚、餐會，以凝聚同鄉的情誼，例如：2014年8月29日的迎中秋慶團圓聚會有170人參加；2015年2月26日的春節茶聚有210人參加，見〈莫道桑榆晚 微霞尚滿天——旅港印尼山口洋地區鄉親校友迎中秋慶團圓紀實〉，《國際日報》2014年9月10日，版A5；〈靈羊奔馳——旅港印尼西加山口洋地區鄉親校友春節茶聚〉，《國際日報》2015年3月11日，版B5。

五、結語

由於中央赤道橫貫，氣候高溫潮濕多雨，熱帶雨林濃密，人煙罕至，導致西加內陸發展緩慢，在西方民族開始接觸婆羅洲島時，這片雨林的原始定居者還過著以游耕、採集、捕獵的生活。近代華人的移入，無疑對於西加的開發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印尼獨立前，西加華人是一個流動性極大的群體，他們或在華人公司興盛時期前來淘採砂金，或在荷蘭殖民時期前來投入農業及工商活動，促其南來的背景因素，不免與改善原鄉經濟困難密切相關。或許就是因為這種頻繁往來原鄉中國與西加之間的流動，原鄉中國社會與西加華族社會得以緊密連結，即便西加華人已經土生數代、擁有土地也從未到過中國，他們的政治與文化意識仍是屬於中國的。但是，二戰結束後國際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化，原鄉中國政權鼓勵海外僑民歸化的態度，或許鬆動了原鄉中國社會與西加華族社會之間的連結；獨立後的印尼在西加激起的排華運動與種族屠殺事件，加劇西加華族經濟上的困境，中國與印尼外交關係的中止，也阻斷了西加華人返回中國的可能，導致他們轉向首都雅加達，甚至印尼境外的「再移民」。有別於其先輩歷史上的流動，這一次，他們對於家鄉的記憶不再是中國的，而是他們土生的西加，這個位於赤道上曾經的異鄉，終成他們心中真正的故園。